

## 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

于学军

**【提要】** 中国人口在经过了50年代和60年代无计划的高速增长、70年代生育水平的大幅下降、80年代的徘徊波动,终于在世纪之交实现了阶段性的突破,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历程,进入了低生育的“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人口转变之所以能在90年代实现历史性的飞跃,是党和政府在人口问题上逐步统一了认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日臻完善,以及社会经济环境快速变迁的必然结果。传统意义上人口转变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口问题的终结。相反,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解决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但是中国,也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

**【作者】** 于学军 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副研究员。

日本厚生省人口问题研究所的人口学家若林敬子在评论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时说:“中国的人口政策是史无前例的,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宏伟实验。如果这种尝试取得持续的效果,世界人口状况将会被改变”<sup>①</sup>。

的确,在过去的50年,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从大肆攻击到逐渐理解和赞赏的转变过程。中国人口伴随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经过了50年代和60年代无计划的高速增长、70年代生育水平的大幅下降、80年代的徘徊波动,终于在世纪之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伴随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两个转变”,以及“三为主”的落实和“三结合”的推广,在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上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进入了“后人口转变”时期<sup>②</sup>。

尽管经过众多学者的修正、补充和完善,也经过了世界人口发展历程的验证,但人口转变论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一直有争议。人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人口转变论是不是一个理论?人口转变有三个阶段,还是四个阶段?如何界定和划分不同的阶段?尽管在以后的研究中引入了诸如生育率转变和生育率革命等概念,试图扩展和完善人口转变理论,“但无论如何,人口转变理论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它至今仍然是最被广泛接受的解释人口历史变化的经典理论”(陈卫、黄小燕,1999)。而且,人口转变的“三段论”至今仍然广为流传。

笔者将概要地回顾和分析中国人口转变的历程,重点论述和说明经过90年代近10年的考验,中国人口确实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时期,从而进入了所谓的“后人口转变”时期。“后人口转

① 若林敬子:《中国人口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页。

② 关于“后人口转变”的概念,详见于学军的有关文章:“解析后人口转变”,《中国人口报》,2000年1月24日,第3版。

变”并非笔者标新立异,其实早有先者引用(邬沧萍、穆光宗,1995)。笔者之所以使用“后人口转变”,旨在提示人们尽快跳出口数量多少和生育水平高低的狭隘视野,更多地关注今后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以及相关的人口质量、结构、分布和开发问题。同时,利用中国人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时机,探讨传统人口转变理论未尽的内容,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理论。

## 1. 50年代和60年代:无计划的“早、密、多”

50年代初,由于多年战乱后社会转入安定,经济恢复,生产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人口死亡率下降,加上“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出现人口过剩”、“人多力量大”的思想观念影响,政府实际上采取的是鼓励生育的态度。因而人口出生率上升,人口规模迅速增长,出现了建国后的第一次生育高峰。

50年代末60年代初,虽然因特殊困难而使人口经历了3年的高死亡、低出生的时期,出生人口规模和生育率均曾降到罕见的低水平,但那是自然灾害的结果。到1962年就出现了补偿性生育,形成了全国第二次生育高峰。

从50年代后期起,虽然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士已经开始认识到了人口的压力和负担,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进行人口控制的倡议,中央政府也允许有条件的人工流产和使用避孕药具,但这时候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也未能形成政府的一贯指导思想。此后是10年“文化大革命”冲击,也就谈不上采取有效的措施了。这一时期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尚在酝酿、讨论和形成之中,人口增长的总体特征是“早、密、多”,自然增长速度达到了近半个世纪的最高峰。到60年代末期,全国总人口已突破8亿,比建国初期净增约3亿人口。

从50年代和60年代历年的死亡率、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和妇女总和生育率来看,除了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困难时期及其补偿性高生育期外,1949~1970年中国女性人口的生育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总和生育率基本在6左右,接近无节制生育状态。而同期内人口死亡率则持续下降,从1949年的20‰降到1970年的7‰,导致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上升。1949~1970年期间,除个别特殊年份外,中国年人口出生率多在30‰以上,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在20‰以上。

## 2. 70年代:有计划的“晚、稀、少”

建国20年人口净增了3亿多,特别是两次人口出生高峰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面对规模如此之大、增长速度如此之快的人口,中国政府开始深刻地反思自己的人口政策,下决心开展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协调共进。1971年,中央提出了人口控制规划,正式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同年还举办了13省市计划生育工作经验交流学习班,总结典型经验。1973年8月,国务院正式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地方也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组织机构,加强了领导。同时,进一步提出“晚、稀、少”的要求。这些政策上的措施,加之广大农村建立起来的“赤脚医生”队伍在避孕、节育方面的宣传及服务,使中国育龄妇女生育水平从70年代初开始大幅度下降。

应当注意的是,那一个时期中国人口生育率过高不仅为中国政府所认识,在现实生活中,孩子多对家庭特别是对妇女,也存在压力。随着妇女解放和妇女地位的改善,职业妇女人数逐渐增加,越来越多的夫妇不希望要过多的子女。“晚、稀、少”的生育政策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从一开始就为多数群众所接受。当时中国并没有一套完整的计划生育组织机构和网络体系,但“晚、稀、少”的生育准则却在70年代的生育人群中,显示出了惊人的效力。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3‰降到1980年的18.21‰;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79年的2.75。

1978年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革,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对人口问题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在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政府把实行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明确的人口控制目标和发展规划,列入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并纳入了国家计划。逐步建立健全了各级计划生育机构,制定了有关的法规,并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为育龄夫妇提供避孕节育技术和社会性服务。与此同时,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普查、调查获得的详细数据和资料,为分析人口与计划生育形势,研究对策,提供了有利条件。

### 3. 80年代:蓄势待发,起飞前的徘徊

继70年代实行“晚、稀、少”政策之后,80年代中国生育政策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其中两个重要事件可作为两个时期的起点。首先是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控制中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接着是1984年4月中,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汇报》(中央7号文件),在强调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大事的同时,提出“要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两次政策上的调整和完善所引起的生育波动及其他人口学后果已经为确凿的统计分析结果所证实。更主要的是,它给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教训是深刻的。它提示人们:人口再生产具有自身特点,对人口再生产的干预要瞻前顾后,谨慎从事。

无论从计划生育政策内容,还是从对计划生育执行力度看,80年代均比70年代更严格,更强化。然而全国平均生育水平并未产生如70年代那样的大幅度下降。在这10年中,全国人口出生率因年龄构成的影响在波动中稍有回升,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则在波动中起伏徘徊,其中1981~1982年和1986~1987年出现两次幅度不太大的回升。总和生育率从1980年的2.24回升到1982年的2.86;1985年下降到2.20之后,到1987年再次回升至2.59;而到1989年又回落到2.35。

在生育水平的宏观变化趋势上,80年代与70年代截然不同。70年代妇女总和生育率单调大幅度下降,80年代则是在一个较低水平上徘徊,但就是跨越不了更替水平这一“瓶颈”。这种变化过程体现了某种客观规律性和必然性,同时也是计划生育政策内在潜力与外部环境的反映。与80年代相比,7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快速下降的优势条件有:(1)起始生育水平高,下降幅度大;(2)在当时的育龄人口中,年龄稍大些的育龄妇女已经有了2~3个,甚至4~5个孩子,再生一个的愿望并不强烈;(3)由早婚早育向晚婚晚育的过渡期中,生育人数相对减少;(4)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和婴儿死亡率的急速下降为生育率的下降提供了先决外部条件。

80年代的情况则有了新变化。首先是生育水平起点低,1980年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24,已经接近了更替水平2.1;再要进一步降低,意味着许多人要忍痛割爱,做出牺牲。其次,经过10年的推移,原来已经生育四五个孩子甚至五六个孩子的妇女大多已退出生育期,而尚未生育或仅生育1孩的妇女群体加入了80年代的育龄人口。1980年11月,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颁布使事实上的婚育年龄提前,从而导致一孩生育堆积。这些因素甚至影响到整个80年代中国妇女的生育状况,从而使生育水平徘徊波动。尽管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没能收到如70年代那样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的效果,但计划生育工作成效仍功不可没。最大的成绩就是使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得到了稳定和完善,为90年代中国人口转变历史性的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不能因为 80 年代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徘徊而否定计划生育工作的成绩。事实上,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生育水平受政策的影响是有一定限度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效力随生育水平的下降而递减已被理论和实践所证实。而且,生育水平不可能永远保持 70 年代那样高的下降速度,果真如此,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早就达到零了。世界上发达国家人口生育率转变的历程也告诉我们,在生育率由高水平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时,往往需要经历一段相对稳定或波动时期,这是一种普遍规律。比如日本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 1953 年降到了 3.0 以上,1960 年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 2.0,而后又回升到更替水平以上,经过 10 多年的徘徊,终于在 1975 年再次降到 2.0 以下,并于 1977 年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 1.80。

#### 4. 90 年代:人口发展实现飞跃,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

传统的人口转变的“三阶段”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是否实现了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变要看其生育率和死亡率的高低和状态<sup>①</sup>。中国人口的死亡率早在 1965 年降到了 10‰ 以下后一直比较稳定,而平均预期寿命早在 80 年代初就达到了 68 岁,90 年代初达到了 70 岁,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水平。因此,考察中国人口转变是否完成了第三阶段,应主要看生育水平的高低和状态稳定与否。我们之所以说 90 年代中国人口发展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进入了“后人口转变”时期,是因为 90 年代后中国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 4.1 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价值观念,是生育行为的决定因素之一。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何时生孩子、生几个孩子、孩子的质量、孩子的性别并非总是与生育意愿相符。也就是说,在生育决策过程中,不仅仅有生育意愿在发生作用,而且还有其他诸如政策、社会、经济、文化、生理、心理等复杂因素在同时发生作用。但无论如何,生育意愿反映的是人们对生育孩子的时间、数量、质量和性别的一种愿望和需求<sup>②</sup>。

以往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90 年代以前人们的生育意愿多数为 2 个以上,而且最好为一男一女。依中国国情而言,人们的这种生育意愿合情合理,无可厚非。即使在日本和台湾这样社会和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们期望的子女数也在两个以上(刘铮,1986;辜胜阻,1988;陈剑、姚敏华,1990)。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没有理由说“中国人的生育意愿落后”或“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传统”。

进入 90 年代后,人们的生育意愿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人们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下降到了 2.0 以下。在 90 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中,我们尚未发现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超过更替水平(即 2.1 左右)的结果。从以下两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略见一斑。

199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家庭经济 and 生育研究”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

---

<sup>①</sup> 虽然人口再生产的类型是以粗出生率、粗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为衡量指标的,但在人口转变的后期,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越来越受年龄结构的影响,所以,衡量死亡水平用平均预期寿命、衡量生育水平用总和生育率是较好的选择。

<sup>②</sup> 有的学者认为生育意愿不是一个合适的指标,因为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前提下,它不能准确地反映出人们对孩子数量的真实需求。这一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即使在面对“假设没有任何计划生育政策要求,你希望要几个孩子”的问题时,人们在心理还是假设有计划生育的制约,还是在不同程度上受现行生育政策的影响。尽管生育意愿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指标,但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生育的预期变化。我们可以想象,50 年代的育龄妇女对孩子的平均预期数量无论如何不会是 2 个,而 90 年代的育龄妇女对孩子的平均预期数量无论如何也不会是 4 个。同其他的观念转变一样,生育意愿的转变需要时间,但一旦真的转变了,再回头也不容易。

表 1 几种生育水平对比

年份	政策要求的生育水平	抽样调查中妇女意愿的生育水平	实际的生育水平
1991	1.6 左右	1.82 左右	2.03 左右
1997	1.6 左右	1.73 左右	1.82 左右

期望生育数为 1.65 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 1.89 左右。1997 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 1.56 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 1.80 左右<sup>①</sup>。

表 1 显示,尽管广大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与政府要求的政策生育水平尚有一定的

差距,但有不断缩小的趋势。从整个 90 年代的发展趋势看,人们意愿的生育水平和实际的生育水平与政策要求的生育水平<sup>②</sup>在逐渐接近。值得注意的是,80 年代以来的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低于实际生育水平。这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育龄妇女中非意愿生育的存在,意味着中国的育龄妇女并没有完全实现自主的生育。帮助广大的育龄妇女实现避孕节育选择的权利,避免非意愿生育既是 1994 年开罗人口与发展大会的宗旨,也是中国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和优质服务重点。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90 年代多次抽样调查都显示,年轻一代平均期望生育孩子数比上一代平均期望生育孩子数有所下降<sup>③</sup>,而且对于生育子女的预期数量和性别选择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和随机性。这或许预示着未来生育水平有可能进一步下降。

## 4.2 生育水平

尽管人们对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四普”)以前生育水平的估计存在一些争论。比如马瀛通等人(1989 年,1993 年)认为,生育率反弹是中国 80 年代人口控制中的一大特征。但是,由于 80 年代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生育节育调查,包括 1982 年 1‰ 全国生育率抽样调查、1988 年 2‰ 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等,数据相当丰富,而且各个调查数据之间的差异基本都可以解释。特别是“四普”把中国人口生育研究带向一个新的高潮。1990 年前的争论是在数据丰富且基本可信的基础上存在的观点和角度的差异,对“四普”所显示的 1989 年总和生育率 2.31 的结果,大家基本认可。

但是,中国 90 年代的生育水平却成为令人困惑和烦恼的问题。问题首先出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1992 年对 38 万人的抽样调查。该调查显示的全国 1991 年和 1992 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1.65 和 1.52,大大低于总和生育率为 2.1 的替代水平。“四普”所显示的总和生育率为 2.31,而 1991 年突然暴跌到 1.65 左右,两年间下降了 0.66。这一出人意料的变化自然引起了国内外许多议论和猜测。一般认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已经接近更替水平,进一步的下降比较困难。而在两年间下降了 0.66,令人怀疑。于是,人们自然想到出生数据漏报和瞒报是对总和生育率低估的原因。曾毅(1995)在人口因素分解法分析的基础上认为,

① 由于数据所限,笔者使用的只是两次抽样调查中育龄妇女平均期望子女数量,而非夫妇共同的意愿。以往的抽样调查数据表明,中国男性平均期望子女数量比女性高 5%~10% 左右。

② 中国人民大学路磊、林富德的估计为 1.7 左右,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财务司郭震威的估计为 1.53 左右,我们的估计为 1.58 左右。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变,不意味着政策要求的生育水平不变。由于人口结构的自然变化会使政策生育率有所波动。比较明显的是,生育政策较为宽松的人口群体,如少数民族人口和可以生二孩地区的人口比例会有所上升,而这部分人口的增加会带动整个政策生育率的提高。再比如说省级地方计划生育条例在过去和今后的修改中,明显的倾向是放松,比如:在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的基础上,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二孩。

③ 例如在浙江省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城乡未婚青年平均生育意愿为 1.3 至 1.6 个孩子,而且男女青年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异。

1991~1992 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并不像 38 万人调查所报告的那样远远低于更替水平,而大致在 2.1 左右。与 1989 年的总和生育率相比,1991 年的总和生育率确有下降。下降幅度的 1/3 左右是由于初婚年龄上升造成的,2/3 是由已婚妇女生育率下降造成的。

人们不相信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1992 年 38 万人抽样调查的结果,也没有其他可信的数据来源,大家期待着 1995 年国家统计局的“小普查”结果,然而结果令人失望。199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只有 1.56,甚至比政策生育率还低 0.2,结果肯定是不准确的。直到今天,没有学者使用 1995 年国家统计局的“小普查”对总和生育率进行分析。对于 90 年代的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人们还在探讨。

纵观 1990 年以来的所有人口调查,还是“四普”数据最全面、最可靠。虽然也有人从局部或个别漏报和错报现象对“四普”数据的准确性提出置疑,但这并未妨碍它仍然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普查之一,也是我们所能获得的信息最丰富、最准确的人口数量来源。

为了确定 1990 年到现在的人口状态,于学军和杨书章(1999)参考近年人口抽样调查获得的信息,特别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年度人口数据,采用人口预测模型,把 1990 年以后各年作为 1990 年的“未来”进行模拟估算,得出以下结论(见表 2)。

表 2 显示,我们估计的结果与国际权威机构的判断基本一致。基本结论是:从 90 年代初开始,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持续地低于更替水平(2.1)。从人口学的角度看,更替水平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转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人口实现零增长最主要的前提条件。如果总和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无论如何人口将继续增长;如果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经过若干年份的调整后(指人口惯性的逐渐减弱),人口即可实现零增长或负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后中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人口惯性,而非高生育水平。相应地,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工作重心是如何稳定已经取得的低生育水平,直到人口增长的惯性消失,最后实现人口的零增长和负增长。

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早在 80 年代初就开始接近更替水平。经过 10 年的徘徊,终于自 90 年代初开始有了一个质的飞跃,10 年来持续稳定地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更替水平在人口转变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人口转变的转折点,标志着人口转变的一次飞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人口发展在世纪之交成功地跨越了更替水平这一“瓶颈”,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从而进入了“后人口转变时期。”

### 4.3 人口转变历史性飞跃的原因

#### 4.3.1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

1990 年 8 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的“八五”人口计划和 10 年人口规划的方案,并由七届人大四次会议获得通过。方案明确提出在 90 年代的 10 年间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年平均 12.5‰ 以内,从而确定了 90 年代控制人口增长的奋斗目标。

199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

表 2 不同机构与个人对中国 1991~1998 年生育水平的估计

年份	于学军和杨书章的估计	美国人口咨询局的估计	亚太经社会的估计
1991	2.03	2.2	2.2
1992	1.82	1.9	2.2
1993	1.81	2.0	2.0
1994	1.81	1.9	1.9
1995	1.78	1.8	1.8
1996	1.80	1.8	1.8
1997	1.82	1.8	1.8
1998	1.85	1.8	1.8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咨询局的估计引自 *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 PRB, 1991~1999; 亚太经社会的估计引自 *ESCAP Population Data Sheet*, ESCAP, 1991~1999。

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这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控制人口增长处在关键时刻,党中央、国务院对计划生育工作做出的重要决策,是90年代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根本性指导文件,是统一思想强大武器(彭珏云,1991)。

1991年4月7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此后,连续9年,每年一次,而且内容不断扩大,从计划生育拓宽到了资源和环境。特别是1999年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工作座谈会”首次提出人口与计划生育是中国可持续发展中的首要问题和关键所在。

1991年,中组部、人事部《关于把计划生育工作作为考核各级领导干部一项重要内容的通知》发布以后,计划生育工作舆论明显增强,力度进一步加大。这样,从90年代开始,中央政府就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环境,为90年代实现人口转变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4.3.2 “三三三二一”工作模式

经过七八十年代的不断探索,90年代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逐步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作路线,即“三三三二一”工作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既要抓紧,又要抓好。坚持“三不变”,即坚持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和既定的人口控制目标不变;落实“三为主”,即以思想教育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避孕为主;推广“三结合”,即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经济、帮助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建立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实现“两个转变”,即由单纯的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综合治理人口问题转变,由以社会制约为主向利益导向与社会制约相结合,宣传教育、综合服务、科学管理相统一的工作机制转变;达到“一个目标”,即达到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实现计划生育工作的良性循环,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三三三二一”模式是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丰富实践和基本经验的结晶,是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在计划生育历史活动中的创造,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必由之路。“三三三二一”工作模式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历史过程,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党政领导干部、计划生育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所认识、所接受,逐渐变成指导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发展,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 4.3.3 社会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人们多生的动力

生育水平的下降和稳定最终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教育程度的提高。9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以后,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经济发展浪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结束了多年来中国理论界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关系的争论,它是对传统体制的变革,而不是修补。它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动,整个社会和经济的运转机制、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的价值观和理想追求、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婚姻和生育观念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给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挑战,但是社会的急剧变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人们有了更多的危机意识、竞争意识、市场意识、质量意识、流动意识、时间意识和选择意识,等等。在生育的问题上,人们也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和选择性。可以说,在影响生育水平的两大重要因素,计划生育政策作用和社会经济发展作用中,后者起着越来越大的决定性作用。

此外,90年代召开的巴西世界环境与发展首脑会议、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开罗人口与发展大会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国人口研究的进步和计划生育科研的发展,也为中国的人口转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由于 90 年代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约束机制和诱导机制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加强和完善,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并持续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连同中国人口稳定的低死亡水平和较高的平均预期寿命,我们有理由说,中国人口在 90 年代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历程,开始进入低生育时期,所谓的“后人口转变”时期。

## 5. 结束语:没有终结的转变

1949 年建国以来,中国人口经历了 50 和 60 年代的高速增长、70 年代生育水平的大幅度下降、80 年代的徘徊波动,最终在世纪之交实现了人口转变的历史性飞跃。

尽管我们实现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历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展望 21 世纪,中国人口问题将趋于多元化、复杂化和隐蔽化;我们不但要面对人口数量的高峰,同时要面对独生子女问题、劳动人口就业问题、老年人口问题等多重挑战。在后人口转变时期,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解决 21 世纪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

最后,我们愿用现任联合国人口司司长约瑟夫·项密的一句话结束本文:“全球人口在同一列车上,我们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但我们知道未来的方向,那就是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进”。

## 参 考 文 献

1. 陈卫、黄小燕:《人口转变理论评述》,《中国人口科学》,1999 年第 5 期。
2. 马瀛通:《人口控制实践与思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年。
3. 马瀛通:《控制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实现本世纪末人口控制目标》,《中国人口科学》,1989 年第 1 期。
4. 邬沧萍、穆光宗:《低生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5 年第 1 期。
5. 于学军、杨书章:《对中国 90 年代生育水平的估计》,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课题报告,1999 年。
6. 曾毅:《我国 1991~1992 年生育率是否大大低于更替水平?》,《人口研究》,1995 年第 3 期。
7. 刘铮:《人口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年。
8. 辜胜阻:《婚姻·家庭·生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年。
9. 陈剑、姚敏华:《人口与计划生育百科知识丛书》,团结出版社,1990 年。
10. 彭珮云:《认清形势,学好〈决定〉,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课题研究》,《人口动态》,1991 年第 6 期。

(本文责任编辑: 朱 萍)